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辩

许 培 玲

“图书馆学是否成为一门科学”是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诚然，在信息社会，人们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因而，要使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摆脱困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屹立于科学之林，其研究方法的变革是刻不容缓的。正如巴甫洛夫所指出的：“方法上每前进一步，我们便仿佛上升一级阶梯，于是我们便展开更广阔的眼界，看见从未见过的事物”。只有在全新的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才能产生出先进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就当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图书馆学研究的哲学期

图书馆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产生了文字以后，便产生了如何保存和传播人类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知识载体的问题，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保存和传播人类知识成果的社会文化机构。图书馆学理论也就是在图书馆工作这一实践的土壤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古代——常识性知识

（know—how）阶段

随着古代藏书楼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就产生了一套关于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方法和文献的加工处理技术的知识，如分类、编目、

典藏校勘、图书馆管理等，这些知识处于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状态，是历代藏书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工作习惯，是对由经验所提供的特殊和有限事例的直观性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形成以前的一种常识性知识，即所谓的“知道怎么办”（know—how）的操作知识。这种知识的特点：是以十分现实的方式说明应当怎样做，应当怎样达到目的，以及一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应当怎样行动。它的产生是概括了种种对已感知的经验模式的反应，对同类情况的同类反应，这就是习惯的形成。

（二）近代——前科学阶段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变成一种为公众所利用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国近代的图书馆学也正是在当时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特别是美国杜威等人所创立的实用图书馆学理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形成的重要原因；其次，长期以来，古代图书馆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产生的土壤；同时，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小农意识及封闭式的思维方式和当时所崇尚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都规定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 and 性质。二十——三十年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产生了一批以翻译西方图书馆学著作，传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为主的图书馆学家。中国近代的图书分类法基本上是以《杜威法》为模式的，是“仿杜”、“改杜”的产物。因而，近

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只是对当时图书馆的实际操作技术及图书馆这一客观实体的解释和描述。是一种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知识,是西方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理论的翻版和变形,属于实践性理论的范围,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深层的学科理论体系。如在对图书馆学对象的研究中,陶述武、杜定友等人提出的“要素说”只是对图书馆这一实体对象外部,对其组成要素作了直观性的描述。可以说,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是一种以解释模式为特点,以感性直观描述为其研究方法的前科学阶段。

(三) 现代——抽象理性向辩证理性过渡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建立了图书馆学系、科,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开始探索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问题。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在知识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把研究的视线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转向阮冈纳赞和芝加哥学派所建立的抽象的、理性的图书馆学研究,力图重新寻求图书馆学的科学原理及理论基础。如从“知识学”的角度来探讨“知识、文献、图书馆、用户”四者的关系来研究图书馆的本质及图书馆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从交流,交流过程交流模式来探究图书馆活动的“交流学派”是把图书馆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抓住了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是社会知识和情报的交流;“文化学派”则把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和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这些都是对传统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突破,它摒弃了传统的、感性的、直观的描述方式,不是将研究对象——图书馆进行分解,孤立地、静止地考察它的各个方面,各组成要素,各种特性,各个阶段,而是力求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较高的理性层次上,进行系统的、全面

的、整体性的、动态性的研究,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逐步从知性(抽象理性)阶段向辩证理性阶段前进。

二、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弊端

(一) 研究体制上的封闭性

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这种分散,个体的小农经济后来逐步演化成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人们思维向度严重的内倾性。同时由于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规范,表现在科学体制上具有严格界限的专业分工。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这些都成为影响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图书馆学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系统,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工作程序,技术手段上进行孤立地研究。而与周围环境之间则缺乏密切的联系;自守门户,不注意从现实生活和科学整体中汲取思想营养,“为图书馆而图书馆学”,图书馆学被描述成为一种以技术总结和描述为主的循环封闭的“馆内科学”。

(二) 认识方法上的求同性

中国封建社会宣传的正统儒家思想及严格的君臣制度形成了一种同一的,封闭式的思维体系,束缚了人们反向思维的能力;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与根深蒂固的自然群体概念也限制了人们的发散思维。这种认识方法上的求同性表现在整个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中,即是人们恪守于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思维活动中总是力求遵循既成的有效的推演程序,认识方法单一,研究方式垂直,理论研究水平长期徘徊不前。

(三) 研究方法上的直观性

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不以客观实体对象的简单的经验描述为目的,而以客观实体对象为认识背景和认识源泉,科学的实质是对客观实体的理性认识。从人类的思维

方式发展来看,它经历着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原始的综合性(直观性)到近代的分析性,现代又趋向于整体化的综合,也就是说:各个时期都有其总体上起指导作用的科学思想,古代科学的主导理论是“直观整体论”,近代科学的主导理论是“机械决定论”,现代科学的主导理论是“系统和统计思想”。图书馆学是一门在人们实践经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学科。作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源泉——以出纳,流通技术和工为中心的应用性研究占很大比重,理性的、深层次的研究较少,而图书馆学理论只限于对图书馆的工作现象,工作经验的描述这种层次的理论是不能指导,推动图书馆的实践活动的,而落后陈旧的实践活动也无法抽象出,升华出高深的理论,两者形成了一种不良循环。

(四) 研究节奏上的超稳定态

科学是一个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结构要素构成的有组织和系统性的知识体,是一个有机的,开放性的系统。其生命力的来源:一方面在于科学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进行信息交换;同时在于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以引起科学知识体系内新的经验要素的积累,而新的经验要素的增加便会导致理论层次的适应性变化。各个层次不仅在水平方向上存在着相互作用,同时在垂直方向上也会引起新的调整和组织,从而导致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的变化。当这两种要素产生质变时,科学革命就爆发了,这是一般科学发展的规律。然而,图书馆工作的一大特点是其具有很强的积累性,继承性,加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严控性所形成的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封闭性一起产生了图书馆学理论顽强的抗变性。因此,多年来除了实践领域局部工作的改进外,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亚节奏、超稳定的状态。

以上几个方面的特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相互适应。封闭性的结果必然是求同性,超稳定态,而

直观性,超稳定态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亚节奏性。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科学中概念革命与社会中技术革命的联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生产的知识化,图书馆工作的现代化是图书馆学研究方式变革的强大机制。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图书馆学的研究必然会伴随着一个艰难的阵痛过程,逐步从“收敛式”向“发散式”转变。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 课题选择的现实性

理性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受实践刺激,从实践中获得内容;同时,实践依靠理性的反思,通过各种对实践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规则及理性、原则的系统阐述而变得不是单纯的模仿、重复。特别在当前,古老而又年轻的图书馆学正面临着两大潮流的冲击。一股来自现实生活中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另一股乃是席卷各研究领域的科学整体化趋势。这两股浪潮改变了图书馆学的传统研究体制,出现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过程。所谓“纵向一体化是指科学与实践相接近。在科学本身的范围内表现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接近。图书馆学研究首先应立足于图书馆的实践活动,使理论研究中中介化。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把理论研究降低到一种经验型,直观型的低层次上,而是要把实践所提供的感性材料进行辩证理性的抽象,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把握其内在本质、内部矛盾及发展变化的规律。但达到这一步以后,其研究进程并未终结,我们应把在辩证理性阶段所获得的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再同研究客体的终极目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关于未来实践活动的计划,方案等。这样人们的研究就经历了抽象理性(知性)——辩证理性——实践理性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以期实现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飞跃。

（二）研究角度的宏观性

图书馆学尚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大家所一致公认的规范。长期以来，从封闭型的古典物理学派生出来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线性因果关系和还原论，研究视野狭隘，理论思维薄弱。还原论是微观的，认为“复杂的东西能够用适合于简单的东西的概念来解释”，主张“把事物分成片断去找出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并考察这些孤立的片断”。表现在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中，微观层次的研究过多，忽略了整体性、宏观性的理论建设。然而，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它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在现代，在科学整体化的今天，思维方式应从还原论向整体论过渡。整体论是宏观的，它突出“组织”这个概念，强调“一个系统多于其各部分纯粹的简单总和”，从而注意“找出这些片断如何相互作用而能使整体起作用”。为了尽快建立公认的图书馆学“范式”着重于全方位的，包括概念，范畴体系，并立足于现代思维水平上进行研究，要打破传统的，束缚人们思想的时空构架，从整个社会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在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来研究图书馆在社会知识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机理等。

（三）研究手段的广泛性

科学整体化分“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是指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各学科之间交叉，渗透，综合的趋势日益突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应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研究方法和范围应突破传统学科的分野，而广泛移植其它学科的科学方法。如吸收哲学、数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领域的方法和成果。但这决不是简单地移植，而是通过它们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和对图书馆学研究适用的一般科学方法，向图书馆学领域扩展。科学方法的移植与渗透，是人类认识深化的一个标志，一方面能促进图书馆学研究的精确化，提高其预见性；同

时可以加强图书馆学的整体化思维及进行综合性分析的系统方法。

方法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它必定是客体的对应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不是方法来框范对象，而是对象决定方法。方法的选择应以是否适应研究对象为基准。方法的适应性是方法论的基本命题。纵观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当前首先是要建立有层次的，有结构的，严密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该体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观念层次”，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其中基本概念是从图书馆这一客观实体出发，在实践活动中、在输入科学系统的大量信息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而基本假设则不能用纯粹逻辑的方法从经验中推导出来，而必须借助于人们头脑中的直觉和想象力，即是由创造性行为产生出来的。在观念层次形成以后，应利用一系列的工具有形成一定的科学模型，模块，即是第二层次——“形式层次”；然后在观念层次和形式层次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演绎法，解释实践中产生的许多现象，进行各种论证，作出科学的预言，形成科学理论的“解释层次”。与此相应，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体系应大致包括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图书馆工作进行具体的、个体的考察；第二层次是对图书馆的整个工作过程从感性中进行抽象，建立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第三层次是对图书馆这一实体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工作机理等，从哲学角度、宏观角度进行考察建立高层次的，哲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只有在多层次，多功能的完善的方法论体系中，图书馆学理论才能得以健康，稳步的发展。